

入侵，內部勢力的叛亂，軍用開支急速增長，低度均衡的財政機制遭到破壞，轉變為一種高度不均衡（high-level disequilibrium）的財政機制。這一方面使得清政府擴大了財源、平息了戰亂，出現了同光中興；另一方面也是以地方菁英的崛起為代價。儘管如此，中央政府卻從未失去對省一級的控制，依舊對地方事務擁有決策權。這種地域化的中央集權（regionalized centralism）在之後的海防塞防大討論中也有所體現，是清政府在內憂外患中生存的關鍵。為了維護統治，消除地方離心力，自強運動、清末新政應運而生，雖未達到理想中的效果，但也維持住了絕大部分的疆域，加深了各民族的國家認同，並在軍事、政治、經濟等方面向著現代化邁進。由此，通過第一、二部分的論述，打破了傳統對近代中國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線性認識，從而將現代中國的形成路徑定義為從領土國家向主權國家的轉型過程。

第三部分包括第七至第十章，著重探討的是國家轉型的第三個突破，即統一集權的現代國家的建立。清朝覆滅後，中國國家走的是一條自下而上的建設路線，從軍閥混戰到國民黨的崛起與垮臺，再到共產黨的成功，無不顯示出地緣、財政和認同這三個變項對於建立統一政權與國家的重要性。由於軍事、財政背靠蘇俄、

江浙財閥，加之以黨化教育，國民黨在一眾軍閥中脫穎而出，逐步統一全國，後來更是在二戰戰場上打敗了日本，成為聯合國創始國和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確立了其政治大國地位。但致命的是，在這一過程中，國民政府從未能真正建立起一個滲透到基層社會的政權，後期更是暴露出在其治理下社會結構的種種弊端。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中國共產黨在黨組織、軍事、財政結構和政治認同上全方位的集中化（all-round centralization），並以此為根本，戰勝了國民黨，建立了新中國。

20 世紀中葉形成「大而強」的現代中國國家，就是以上三個突破的質變結果。這三個突破分別有其自身的邏輯與活力，正是在它們的共同作用下，中國走向現代國家的道路才會與世界其他地區常見的從帝國到民族國家的「正常」過渡截然不同。綜觀全書，李懷印採用了宏觀史學的歷史研究方法來考察三百年來中國國家的轉型過程，試圖以比較的視角找出在此過程中的一般性趨勢，並且能夠與新清史、民族國家等研究進行對話，這種歷史敘事背後的眼光、格局，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崔馨，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碩士生）

「滿洲国」の日本人移民政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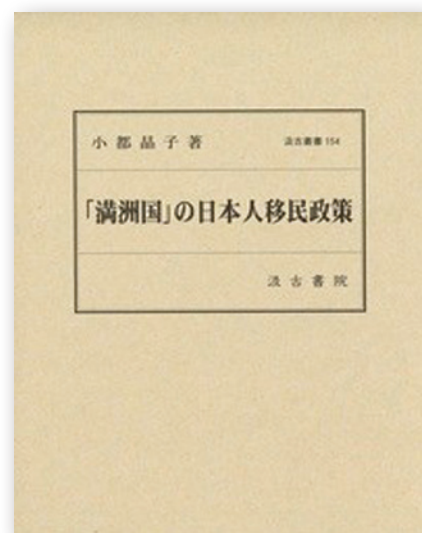
小都晶子

東京：汲古書院，2019

243 頁。ISBN 978-476-2960-53-6

自 1970 年代以來，日本的滿洲移民史研究在全面展開下，累積了豐碩的成果。除了以往的日本殖民地史和日本近現代史之外，近年也有許多從農業史、社

會學領域等展開的研究；因此，無論是研



究視角抑或史料，都令成績變得更加多元化。然而，如何在中國東北地域史的框架中理解滿洲移民，依然是日本學界有待繼續深入的課題。因此，本書從中國東北地域史對「滿洲國」的移民政策，及其帶給地方的變化和影響等，進行了詳細地分析。

本書除〈序言〉和〈結語〉外，主要分為兩部分，共有七章。第一部「中央的政策決定與實施」，從第一章至第四章分析滿洲國移民行政機關的變遷，及其主要業務——移民用地的取得。第一章〈從移民機關的設置看滿洲國的政策參與〉，以「土龍山事件」的處理為契機，釐清滿洲國政府逐步開始從制度面上參與移民政策之策劃和實施。之後1939年「滿洲開拓政策基本要綱」的發布，也成為滿洲國政府直接參與移民政策的轉折點。簡單來說，滿洲國內的滿洲移民政策實施，基本上委託給了滿方。然而，關東軍也通過在總務廳設置各種委員會，保留了對政策「內面指導」的途徑。第二章〈移民政策的制度化與戰時體制的過渡〉，分析滿洲國政府考慮到政策對地方的影響，所以實施過程中提出了「未利用地開發主義」和「大陸新農法」等方針。在實施移民政策中，滿洲國雖然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但1943年進行「開拓增產」政策後，政府對地方的顧慮卻逐漸消失了。第三章〈移民用地的獲取、開發、分配〉，檢討1939年後滿洲國以未利用地為中心，獲取移民用地，同時對鹼性土地、濕地等施行土地改良。但實施「開拓增產」後，「未利用地開發主義」方針被放棄，轉為成效立見、性質較強的「緊急農地造成計劃」。第四章〈滿洲國立開拓研究所的調查以及研究〉，介紹滿洲國立開拓研究所的功能。該所係以開發利用土地、確立耕作方式和改善農村生活為目的而設立的機關；此外，積極錄用京都帝國大學農學部出身的年輕研究人員，並利用「京大式簿記」對於農家經濟進行調查，且成果以多種形式發表。不過，其研究內容與當時的移民政策並非一致。

第二部「在地方上的政策實施」，從第五章至第七章，探討滿洲國的移民政策於地方的實施過程及問題。第五章〈日本人移殖與地域的抵抗——以三江省樺川縣為例〉，闡述當地農民的抵抗以及相關政策的實施。滿洲國政府為了減輕土地購買過程中地主階層的不滿，故施行諸多對策。當地農民也試圖通過各項交涉，確保自身利益。作者指出：日本移民的農業經營方式是走向「地主化」，但如果從當地過去社會結構與階層關係來看的話，如此「地主化」亦具有穩定社會的一面。第六章〈「未利用地開發」的實施——以錦州省盤山縣為例〉，檢討1939年以後滿洲國政府在盤山縣的土地改良工作。此一大規模工作的展開，新增稻田有2.5萬公頃，並提供了抽水、排水設施，以致有7,000多名日本人移入。這項盤山縣的土地改良，可從近代東北土地開發史中來理解，但也不能忘記「開發」背後的真正目的。第七章是〈戰爭下的「開拓增產」和「農地開發」——以吉林省德惠縣為例〉。滿洲國初期，德惠縣實現了土地所有權的一元化（「蒙地奉還」），並通過對第二松花江的治水活動，使得農業環境發生極大轉變，帶給日本開拓民獲益匪淺。惟直到實施「緊急農地造成計劃」之後，政策便轉成為掠奪已耕地和強制動員勞動力。該政策結果引發當地農民的不滿，而且日本戰敗後還將怨氣發洩到日本開拓民身上。

本書從中國東北地域史的歷史脈絡出發，分析滿洲國各階段的移民政策，闡明其「自主性」和「獨立性」。此外，各事例都放在較長時段（清末—新中國時期）內來探討，揭示移民政策對東北地方社會的轉變及其持續影響。換言之，本書可調為中國東北地域史、日本殖民地史等多重領域所必須參考的研究。（菅野智博，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副教授）